

一

在中國 30 年的改革、開放中，圍繞著國家和市場關係的總綱，越來越多地出現了關於所有制結構、國有經濟佈局、國有企業、非公有制經濟、公共服務、事業單位、收入分配特別是初次分配和勞資關係等敏感問題的深入討論。

按照新古典經濟學，尤其是其中奧地利/芝加哥學派（即新自由主義）的理論觀點，解決以上這些問題的方案早已是一氣呵成的，非常簡單。在「帝國經濟學」面前，實踐的歷史「終結」之前，經濟學的歷史早已經「終結」了。

比如，奧地利/芝加哥學派認為，在最具代表性、集合性的國家與市場的關係上，國家（政府）的活動應該限於保證合同履行、提供警察和國防服務的範圍內。除此之外，其他公共服務領域和全部產業領域，國家統統退出。其中「理性預期」學派比弗里德曼更激進地認為，連最簡單的貨幣主義的宏觀調控措施也是不必要的。產業政策和經濟活動中的其他規制，當然更要取消。在社會公平問題上，弗里德曼強調實現機會平等，中國有的經濟學人和法學人就奉為至寶。對此，一位海歸學人的質疑是：醫院大門隨便進，機會平等，但無錢不能看病，這就行了？

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規範中，市場經濟是一種主要由個人和私人企業決定生產和消費的經濟制度。保守主義和奧地利/芝加哥學派在這個問題上是一致的。後者還認為，市場

經濟越自由越「到位」，在理論規範上甚至超越了古典經濟學。

所以，按照這些來自新古典經濟學兩個流派的基本的經濟學規範，中國的「改革」和市場經濟「到位」，就是建立私人經濟為主體的、最為自由（或者是相對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在最為自由的市場體制中，國家資本（美國 GDP 裡面國有資本的產出佔 3%）和公共服務最小化。政府盡可能不干預收入分配問題。在初次分配領域，稅收應該最小化，以刺激投資，增加就業；政府對於勞動力市場的干預（包括最低工資制度）和參與，以及工會和僱主組織都應該取消，以保證供求關係和價格的調節作用，實現最優資源配置和效率優先。同時，蛋糕做大了，也盡可能不要分給普通僱員和窮人，以刺激他們積極地工作或者去求職。為此，二次分配和福利制度應該最小化或者取消。

與自由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政治制度，只是代議制民主，或者說，是美國式民主。

根據這些理論或者建議，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循規蹈矩地踏著新古典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的舞曲節奏，按部就班，最好是通過蘇聯式的「爆炸療法」一步到位至「休克」。在新古典經濟學內部，這種做法不僅為自由主義者所持有，並積極在他國付諸實踐，保守主義的大宗師薩繆爾森對「休克療法」也頗為欣賞。

在這種語境中，本文起始列舉的那些敏感問題是沒有必要進行討論的了。國內一些經濟學人和「改革」專家的所謂「不爭論」，實質就在於此。雖然，中國人都知道，說這句話的那位老人，在歷史上對於「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態度和處理絕不僅僅是「爭論」而已矣，他是要採取組織手段處理的。由此可見，今天的中國「自由、民主」又進步了。

當然，我們也清楚地看到，新古典經濟學中奧地利/芝加哥學派理論的可行性存在大大的問題。第一，它在美國國內和

歐洲傳統市場經濟國家就沒有像模像樣地徹底試驗或實行過（英國的試驗也不徹底，如沒有取消福利制度和關稅壁壘）。它就像美國的新式武器首先拿來在前南聯盟和伊拉克戰場上試用一樣，一開始就把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其中的轉軌國家當成了第一批試驗品。舉其大者，如在拉丁美洲；前蘇聯等國次之；再次之是治理亞洲金融危機。另外，在一些外國人的眼中，1990年代的中國竟然也成為了新自由主義最大的試驗場。2006年，英國著名經濟學雜誌的一位首席記者提出的問題是：英國資本主義的全民福利制度是社會主義的，你們說自己是社會主義，但為什麼長期以來就沒有呢？

當然，在特定的價值觀下評論，這些試驗沒有一個是成功的，它們以「華盛頓共識」的崩潰而告終。雖然，西方一部分經濟學家認為，鉅大的代價是體制過渡的成本，轉軌應該是成功的，反對者是民粹主義。但是，美國為什麼對已經轉成資本主義的俄羅斯還是不依不饒，要將民族分裂和「顏色革命」繼續到底？美國實行的是一種什麼主義？劍橋大學畢業的王小強博士的解讀是，美國實行的是「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轉軌只是第一步，終極目標是圍繞美利堅世界第一的目標弱化你，消除你方方面面的競爭力——這是符合經濟學中最大化原理的。

第二，即使在資本全球化的推動下，從1980年代到2000年代，美國部分實行了奧地利/芝加哥學派的建議，結果卻令人沮喪。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政策使美國延續了47年的收入分配改善進程發生了已經長達30多年的長期「逆轉」，2006年美國的基尼係數達到0.47，奧地利/芝加哥學派的公信力大為下降，激進的自由主義改革派——里根總統和布什總統受到的批評也不在少數，共和黨的執政基礎也被新的兩極分化所瓦解。英國等歐洲傳統市場經濟國家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景和趨勢。

第三，在全球化中，針對奧地利/芝加哥學派（即新自由

主義)的理論觀點和「改革開放」的政策性建議的「爭論」幾乎無處不在，也全球化了。一些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也沒有置身事外，而是積極參與，深入討論，持之以恆。一點不誇張地說，拿薩繆爾森的《經濟學》第17版與第10版比較，他現在的批評(或「爭論」)重點已經是奧地利/芝加哥學派，而不是馬克思和社會主義。更進一步的行為是，一些經濟學家已經持續地對新古典主義的許多理論結論和政策性建議，提出了嚴重的質疑和反建議，開始了新的綜合創新。

奧地利/芝加哥學派在實踐層面遇到的挑戰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在抵制各種內、外干擾中穩定地挺進，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國民經濟保持了長期的快速增長。歐洲的自由主義經濟改革進入了拉鋸戰，民眾抵制，久拖難決，攻堅失利，右翼黨派和政府的立場已然退縮和軟化，「撒切爾主義」鹹魚不翻身。俄羅斯普京總統當年響噹噹的自由主義言論已經不再，而是乾脆表現出向社會市場經濟體制靠攏的趨向，還實施了一些「國進私退」的強硬政策。在拉丁美洲，具有民族特色的「社會主義運動」在美國的後院日益興起，喧鬧一時的新自由主義一地雞毛。在美國，經濟自由化的進展和自由化建議脫節的現象告訴人們，自由化思想在社會和政治層面遭遇到抵制，實踐已經在批判無限自由主義的暢想曲，因為，它走調了。

歷史沒有「終結」，經濟學理論和經濟政策的研究和爭論也沒有停滯。歌德的詩句還是在人類思想的迴音壁上悠然縈繞，「生活之樹是長青的」。經濟學家需要學習哲學了。

全球化經過30多年來新自由主義的洗禮，倒是再一次通過全球的兩極分化加劇宣示了兩個亦事亦理的東西，其一，美、歐式的自由「市場經濟加劇不公平」。而新自由主義在發展中國家倡導的「改革開放」，形成的或者是「權貴資本主義」盛行，或者是外資壟斷國民經濟命脈，或者是兩者兼

而有之的「變態」、「病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些形形色色的市場經濟，共同點都主要是為兩極分化中的大資本、大富豪一頭作嫁。它們不是中國改革、開放所追求的正道，而是要高度警惕的「改革陷阱」。其二，經濟學有價值取向。為什麼人服務是經濟學的大本大源。中國要警惕新古典主義特別是奧地利/芝加哥學派的不良影響。

二

眾所周知，在中國的政策性研究行當和經濟學界，在本文起始列舉的那些改革、開放問題上，從1990年代以來至今，一種浪漫主義的說法是，已經相對形成了百舸爭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的局面。

其中，各種形態的學術思想，包括西方新古典經濟學中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觀點，對於中國政策制定過程和理論界的影響，似乎大都可以在體制內、外的文獻中找到證據，或者是看到痕跡。有的影響所至，直指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大眾利益（包括不多的社會福利）的削減，給社會公平和正義帶來負面影響，在國內不同階層都引發了討論和爭論，在國際上也引起了來自經濟學界和各類國際性權威機構的批評性輿論。這多少抑制了右翼人士在媒體和各種論壇上的張揚言論。

在2007年10月以後，極右翼的某些聲音在媒體方面的市場一時間也開始縮小了。但是，事情並不會一勞永逸地結束。舊的影響還在，根深蒂固；思想的發散和人才的「輸入」（包括「提拔」人才）還在進行，不能說打回頭浪的可能性已經沒有了。例如，新華社2007年12月8日以解讀十七大報告為由，發表了題為〈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的文章，該文提出「1997年以後，國有

經濟和國有資本逐步向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向大企業集中，而從一般競爭性行業中逐步退出」。^① 但是，在十七大報告中並沒有提出國有經濟從「一般競爭性行業中逐步退出」和向「大企業集中」的觀點，這是強加在十七大報告上的說法。在 2000 年以來，國務院國資委對「國有資本從競爭性領域退出」的觀點也是持否定態度的。這也不符合 1997 年以來國有資本佈局調整的歷史。最後，從 1990 年代以來，這種說法的專利一直屬於體制內的右翼經濟學人和官員。其實，關於這個老問題，劉國光先生的評論是很客觀的。他引經據典，在 2007 年 9 月發表的〈關於分配與所有制關係若干問題的思考〉中指出：「中央政策也是很明朗的。十五大報告就規定，『在其他領域（主要指競爭性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經濟的整體素質**』。十六屆三中全會也講到，在增強國有經濟控制力以外的其他行業和領域（主要也是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通過重組和調整，在市場經濟中『**優勝劣汰**』。並沒有規定國有經濟一定要退出的意思，而是說可以在競爭性領域參加市場競爭，『**提高素質**』，『**優勝劣汰**』，『**加強重點**』。」

再如，《中華工商時報》在〈2008，春天奏鳴曲（中篇）〉中就「新一輪改革」報道：2008 年 1 月 12 日，幾個「當今中國頂尖的經濟學家在北大百年講堂開講」，其中突出的改革訴求，就是中國一定要實現「小政府」+「市場經濟的本質就是民營經濟」（包括土地私有化）的目標。這完全是在「頂尖的」倒賣新古典經濟學特別是奧地利／芝加哥學派的初級教材和其陳腐不堪的「改革建議」（「華盛頓共識」），「打右燈往右拐」。看來，2008 年中國的思想界會更熱鬧了，但是，

① 《北京日報》，2007 年 12 月 9 日。

「頂尖」們在理論和政策性建議方面確實了無新意。

在新的改革、開放探索中，是沒有人能夠擔保一帆風順的。一位領導人說，今天的中國在進行新的長征。而歷史告訴今天，長征道路確實是曲裡拐彎的，並且遇到不少來自內部和外部的風險，共產黨、紅軍和老百姓都付出了鉅大的犧牲。

三

在特定的視角上看，在所有制結構、國有經濟佈局、國有企業、非公有制經濟（包括外資）、公共服務、事業單位、收入分配特別是初次分配和勞資關係等改革、開放的構成要素中（不是全部），其中任何一個題目在實踐中發生了某種偏差，一方面，都會明顯地對國計民生產生負面影響，增加中下層收入人群特別是窮人的煩惱和不幸，會影響整個社會改革、開放進程的走向，並增加政治基礎的不穩定，甚至是在國家安全方面增加失控和危險的因素。

另一方面，當人們感覺到或清楚地認識到這種偏差時，就會對其相關的理論觀點和政策性安排提出質疑，展開爭論。這意味著，在當今世界各種理論觀點爭相影響中國的時候，如果哪種觀點一時間在政策性層面發揮了比較明顯的影響，就會開始受到政策實踐和民眾的嚴格檢驗，以及越來越理性和嚴格的評論。在中國政治民主的進程中，這是一個好現象。

當然，有些在媒體上風行一時的理論觀點和政策性主張，並沒有在政策層面產生實質性影響（如「土地私有化」），但是，僅僅因為它們意味著對於合理或不合理的政策方向的批評和否定，也會引發爭論。畢竟，經濟學人的觀點和主張一旦付諸實踐，就可能導致資源和利益的再分配，有得有失，有榮有辱。損了少數人，有幾個人要說話；損了多數人，危及了國

家，就有更多的人要爭論不休，直至所謂的「精英集團」中發生觀點上的公開分裂，社會上群體性事件快速倍增，等等。

四

這本書是2004~2007年期間，個人參與公共政策和相關理論問題討論的文章的集結。其中，第一部分是討論理論上本源性的大是大非問題，其他更多的內容則集中在公共政策的層面，圍繞著本文開頭列舉的那些重要而敏感的改革問題提出了分析和建議。有些補充性評論，也包括了2008年初出現的異像。這些主要**面對體制內的某些自由主義和官僚化傾向**提出的各種政策性問題的討論，有批評和建議，難免在一些問題上針鋒相對。

在討論中，文章盡可能地結合中國的現實問題，援引或者介紹傳統市場經濟國家的有關情況，包括理論研究成果和數據，形成一幅比較的畫面，以在一個更為寬泛的視野中凸現所討論問題的實質和走向，凸現一些自由主義論者有意無意地閉目塞聽，抱殘守缺，忽視或掩蓋西方經濟和經濟思想中不利於他們的動態，將私有制主導的市場經濟浪漫化，誤導輿論、思想和政策選擇的行為，擊破迷信，解放思想。

書中關於浙江省勞資關係的調查文章，得到趙大東、林新英和陳海春三位老同事的個人資助，得到許多人自覺和自發的各種幫助，令我感動，在此謹表謝意和感激。其餘則是所得稿費在自我資助。所以，它們品格都是獨立的。至於書中的專欄短文，大都是在編書過程中我臨時補寫的。

這些文章的基本內容和觀點如下：

——經濟思想史、經濟學和經濟史都說明，經濟學和市場經濟存在「為什麼人服務」的**大本大源**問題。

——相對於**財富和收入的兩極分化**不斷加劇的傳統市場經

濟而言，「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和「國家調控市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人類經濟體制改革實踐中最有希望的探索和事業，是 21 世紀的「新長征」。

—— 所有制結構改革，包括競爭性產業領域、壟斷領域、公共服務領域（如公立醫院）和重要的大型工業基地（如東北）的所有制結構改革，都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非公經濟 36 條」也要受憲法規範。要完善改革的決策機制，完善配套措施，及時總結國內、外的經驗教訓。也要警惕新自由主義和既得利益集團在這些重要問題上的影響。

—— 國有經濟佈局調整和國資減持要維護保障和發展社會公平的底線，要維護促進了國民經濟長期快速增長的微觀基礎：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元化競爭性格局。國有經濟佈局調整的決策機制「要與國際接軌」，要與政治民主化和決策科學化接軌。全面建立「選舉人—— 議會（人大）—— 政府—— 企業」的委託代理機制刻不容緩。國資的進退取捨和國企改革，必須盡快實現法制化和現代化，接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審議、監督和問責。2007 年 12 月已經進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程序的《國資法》不能迴避這種至關重要的大問題。

—— 事業單位改革要強化公共服務、法制和公平機制，要制定科學合理的總體改革方案。涉及近三千萬人的事業單位的人事制度改革，必須真正地、徹底地納入接受《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等法律規範的軌道。

—— 在初次分配領域完善勞資關係協調機制刻不容緩。否則，所謂的「二次分配」杯水車薪，難以解決實質性問題，不可能達到總體上改善中國收入分配狀況和建設和諧社會的政策目標。另外，多年來勞資爭議增速數倍於 GDP 增速的事實提示，勞資矛盾已經成為需要政府和有關非政府組織著力解決的一個重大社會問題。

—— 從更廣闊的視野上看，在改善收入分配的基本制度安

排方面，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性經濟制度具有關鍵意義。要在這個前提下引導、鼓勵和支持其他經濟成分健康發展。同時，要著力發展政治民主和公民社會機制。大量事實和國外權威的經濟理論分析表明，近幾十年來，傳統市場經濟國家依靠私權、市場、代議制和公共服務四項工具，在經濟增長、「蛋糕做大」的背景下，並沒有擋住收入分配狀況一直長期「逆轉」的趨勢。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在當今私有制和自由市場經濟主導的世界中，「尋底競爭」盛行。發展中國家也不例外。

細心的讀者能夠發現，這本書中的觀點和建議，有的已經和思想界相同的聲音一起，融入了當時或新的政策日程之中，如有關所有制結構調整的一些內容，有關初次分配和勞資關係的一些內容，有關事業單位改革（包括「醫改」）的一些內容，等等。而有的仍然在與不同的觀點和政策性意見「較勁」，都沒有歇著的。只要中國的「新長征」還在走，不同的經濟學思想都還在努力向政策領域滲透，思想領域中還存在著衝撞和激盪，這本書中記錄和爭論的問題就會忽明忽暗地頑強存在著，某些一時似乎解決了的問題，也可能翻牌。

這裡強調的一點是，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問題，要害在問題的背後。背後問題比較多，輕一些的是某些政策的協調性和系統性不足，有關的經驗不足，這屬於工作層面的原因，相對較好解決。重要的是無知和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這兩者還相輔相成地發揮作用。俄羅斯一些原右翼知識分子對此有切膚之痛的感受，一些人從熱烈地擁抱「休克療法」、「美式民主」到面臨民族浩劫時，因絕望或自殺、或反思，就是例證。真誠熱愛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沒有體制轉軌和市場經濟的知識，無知無畏，一往無前，結果不善。「善良的願望鋪成了通往地獄的道路。」一位美國經濟學家對此的感歎是，他們「早知現在，何必當初」。在中國，由

於知識界歷時已久的分化，對於他國轉軌悲劇的耳聞目睹和商業習氣的多年浸潤，現在的自由主義者中會自殺的「老九」從根子上就是沒有的，「反思」也免談，但是，固執偏見、「無知無畏」和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卻是舉世公認「有」的。這是危險的要害所在。例如，體制內一些「老九」和有的官員關於全面私有化、自由化和美式民主化的主張，其中一些人是老謀深算，投機取巧，上下遊走，另一些人是對這三化充滿了浪漫主義的遐想和情懷，一有機會，或捧場，或張揚，是為案例。

書中的內容不代表我所服務的單位。但是，這裡還是應該表達對自己服務過的單位的謝意。1985年我進入國家體改委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工作，在這樣一個出色的研究團隊中工作，使我受益匪淺。1991年底單位改名後，我仍然在其中工作，一直到2003年機構改革，才隨著研究所轉到國家發改委宏觀院系統工作。我在國家體改委、國務院體改辦的研究所工作期間，多次參加中央和國務院下達的重點課題調研和寫作，特別是參加中共十五大、十五屆四中全會和十六大政治報告（或「決議」）寫作組下達的專題調研報告工作時，身處一個由各級公務員組成的集體之中，因此受到的薰陶對我從事公共政策研究是非常有幫助的。

除關於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專題文章、專欄和個別附錄之外，書中的文章都是首先在《香港傳真》上及時發表，爾後，再分別於其他公開媒體上刊登的。在這方面，創辦並主持這個刊物的王小強博士作為它們的第一讀者的理解、支持和及時而非常專業化的建議，對我的幫助很大。這本書的緣起，也是來自他的提議。在此謹表謝意和感激。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劉國光先生在百忙之中為本書作序，我也在此謹表謝意和感激。

在編書時，我按照專題對原文章內容進行了新的組合，沒有根據原來的時間順序編排。但是，每一部分或章節，都註明

了所用原文的標題、發表刊物和發表時間。有的地方，修正、補充了一些資料、數據和文字。但是，原文的觀點和邏輯沒有變化。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這是楚國人屈原的話。社會、主義、學科和個人，都應該是這樣的。

夏小林

2008年2月